

甌風

OU FENG

二〇一一年三月
新刊第二集

黃山書社

甌風

—
OU FENG

新刊
第二集

黃 山 書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瓯风新刊. 第 2 集 / 方韶毅主编. —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3
ISBN 978-7-5461-1689-1

I . ①瓯… II . ①方… III . ①社会科学—丛刊
IV . ① 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6389 号

瓯风 新刊第二集 方韶毅 主编

出 版 人: 左克诚	艺术总监: 何天健
责任编辑: 汤吟非 江 汇	装帧设计: 谢作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电话: 0551-3533768
印制: 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 0577-88219850
开本: 69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4	字数: 18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1689-1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品人
吴明华

策划
温州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策划中心

主编
方韶毅

目
录

特稿	二〇〇四，我们登上钓鱼岛	虞海泽	一
	寻找父亲王人驹	金丹霞	二三
人物	英人苏慧廉与晚清温州	端木敏静	四一
	我的父亲董每戡（下）	董 苗	五七
	朱维之：从天堂到人间	瞿光辉	九一
记忆	迎春献词		
	——记朱维之师二十四年前兔年贺卡和书信	丁景唐	一一七
	感念三位启蒙恩师	黄鸿森	一二〇
	忆希真师	林翘翘	一三二
	名高北斗心系温州		
	——记与黄宗江先生交往的那些事儿	李 淳	一三九
	忆族伯宪文先生及文献丛书的缘起	张 索	一四六
	昨日黄华说旧家	高 远	一五二
	海军宿舍往事	纪 宾	一六一

笔记	李杜韩与江心孤屿 池上楼流风遗韵 ——晚清温州女诗人张凤慧事略	沈洪保 吴景文	一七七 一八一
序跋	《陈增杰集》自序	陈增杰	一八四
口述	温籍当代作家访谈录 张翎：从容在路上	孙良好 陈伟伟	一八七
逸事	吴藕汀与温州	金传多	一九四
编后	喜和忧	编 者	二一一
老照片	中国的威尼斯		封二
档案	《瓯风杂志》第二期书影		封三

二〇〇四， 我们登上钓鱼岛

虞海泽

一

特稿

二〇〇四年从钓鱼岛回来后，在乐清深海蓝鲸俱乐部，一位香港记者采访我时提了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温州人，也是一个老板，为什么会去做钓鱼岛的事？”从她奇怪的眼神里我读出了话外之音：温州人只知道赚钱，不会关心领土问题，更不会冒险出海去钓鱼岛。记得我是这样回答她的：因为没有人去做我才去做的！二〇〇三年冯锦华在网上发帖呼吁去“保钓”时，应者寥寥无几！我是看不下去了才去做的。这是中国人的事，如果没有中国人去做，那就是中国的悲哀。其实，问这个问题的人远不止她一个。近几年来有好些人甚至生意伙伴都问过同样的问题。我想，生命是有限的，钱是赚不完的，财富是整个社会的。有意义的经历才是最有价值的。只有自己的经历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策划

二〇〇三年六月，大陆“保钓”首航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够登上钓鱼岛。用登上钓鱼岛的实际行动来宣示国家的主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行动，但这个太难了！二〇〇三年我们一艘一百二十吨的渔船被九艘带飞机大炮的日本舰艇包围而被迫返航的情形犹如发生在昨天一样还历历在目。我们迫切需要一次登岛行动。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和冯锦华不谋而合。我们俩总结了二〇〇三年三次出海失败的教训，觉得可能登上钓鱼岛的方式应该只有两种：

一是硬闯。采取多船齐发和日本舰艇混战。根据渔民的经验，两艘舰艇才能绑架一艘渔船。日本上次一共出来九艘舰艇围堵我们一艘小渔船，迫使我们返航。但如果我们同时出动三十艘渔船的话，日本人会有六十艘舰艇吗？那霸港口应该没有那么多舰艇。这样，日本人就很难阻止所有的渔船靠近钓鱼岛。只要我们有一艘渔船能够突出重围，登岛就可能成功。这种办法可行，但成本太高，如果每条船花十万的话，就算短期之内筹到三百万元，也很难一下子找到三十艘渔船。

二是突袭。突袭的第一个棘手问题就是怎样躲避日本人的雷达。二〇〇三年六月，“保钓”首航渔船在距离钓鱼岛四十五海里时就被日本的侦察飞机发现；距离钓鱼岛三十六海里时被日本舰艇跟踪；距离钓鱼岛二十海里就已经被多艘日本舰艇包围；到距离钓鱼岛十二海里时已经有多达九艘日本舰艇和五架飞机同时包围了我们。一个方案就是采取隐形的办法登岛。如何使渔船在日本舰艇雷达上隐形，这个技术问题我请教了在北航读博士的牛力丕，他说只要知道日本舰艇雷达波的波长，就可以设计出简易的渔船隐形方案。最终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日本人的雷达波波长。如果想要突袭成功，如何尽可能晚被发现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为此，我和冯锦华想尽了办法。

二〇〇四年春节过后，我和冯锦华开始分头行动。他去了宁波北仑走访渔民，弄回来一张标有海区的高级别海图。我去了玉环拜访几位经常去钓鱼岛附近海域打渔的船老大。船老大一般都很有主见，喝酒的时候，听他们大声侃侃道来。玉环普通话不太容易懂，有时候需要他们重复说好几遍才听明白。最后把几个船老大的信息凑起来，总算是基本弄清楚了钓鱼岛的一些情况。

钓鱼岛附近海域的鱼资源很丰富。每年春节前后有大陆的、台湾的渔船在离钓鱼岛三十海里的二六〇海区捕鱼，同时出没的还有

觅食的鲨鱼。清明节后，天气变暖，鱼群开始北上，渔民们和鲨鱼也跟着鱼群北上。也就是说春节前那里的渔船最多，春节过后渔船逐渐减少。清明节后，渔船跟着鱼群北上，很少会有渔船在这个海域打渔了。如果有渔船的话，顶多也就一两艘渔船在捕捞一些价值不高的做饲料的“扒皮鱼”（温州话）和其他杂鱼。

钓鱼岛如同一轮翡翠绿的弯月横在东海，非常漂亮。弯月的外侧是陡峭的悬崖，水应该很深，利于航行，但不利于船舶停靠，就算是勉强靠上了也很难登岛。弯月内侧地势平坦一些，但水较浅，岸边恐有暗礁，也难以靠岸。我们查询资料，知道日本人曾经在岛上修过码头，估计是在岛屿的内侧，但无法确定位置。与飞机起飞一定要逆风而上的道理一样，船舶也要在逆流的情况才容易靠岸。如果水流是顺流，船就很容易撞上岛屿。再加上有日本人在旁边干扰，登岛的难度就更大了。而且一年中水流的方向也是随着季节改变而改变的。因为岛屿地理情况比较复杂，我们的民间手段也着实有限，再加上还有很多不可控的人为因素，尽管我们费了不少时间和周折，但是，直到出发之前也没有最后确定登岛的具体位置。我们把一部分希望寄托在有着丰富经验的船老大身上，另一方面也只能够相机行事了。

在调查钓鱼岛相关信息为登岛做准备的过程中，我们知晓了很多当地渔民长期遭受日本人欺负的情况。玉环渔民自有了远航的机动船以来就一直在钓鱼岛海域以打渔为生。但一九七〇年以后，被日本的舰艇驱赶，他们不能再靠近钓鱼岛海域打渔，只有在躲避风浪的时候才能够靠近钓鱼岛，平常只能在远离钓鱼岛三四十海里以外的海域打渔，眼看着钓鱼岛周围丰富的鱼类资源兴叹。

筹备

跟做企业一样，做完前期的“市场”调查工作后就需要做具体的筹备工作了。在走访渔民的同时，我拜访了两位老板，目的是想租用他们的大快艇做登岛之用。一位是苏泊尔的老板。他们公司有一艘快艇是原来温州到上海海上航线的交通工具，产自澳大利亚，速度非常快，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快艇有得一拼。如果能够租到这艘船的话，去钓鱼岛的时候可以先用渔船的速度行驶，等到了钓鱼岛海域被日本巡逻飞机发现时再发动冲刺，靠近钓鱼岛，把人和皮划艇一放，人就可以登岛了。凭这艘船的速度，我估计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快艇也奈何不了它。只可惜没碰到老板，跟办公室主任谈了，他同意给老板带话，但后来就没有了回音。另外一位是经营温州到洞头快艇客运的夏老板，通了几次电话，得知他们的客船小了点，抗不了大风浪，去不了外海（温州到洞头还算不上外海）。

无奈之下，我们放弃了租用大快艇的计划，改为租用渔船配合使用小快艇。于是，在灵昆岛弄了一条旧玻璃钢小艇和两个发动机。我和冯锦华、尹冬明用这条小艇在灵昆岛的南边水面上进行专门训练，也因此多了一门开快艇的技能。后来又从哈尔滨弄了一条橡皮艇回来，据说是俄罗斯军用的。

二〇〇三年第一次去钓鱼岛，船老大是被我们骗出海的。开始只说是要去海上旅游，等船行了大半才告诉船老大曾生姆：我们要去钓鱼岛！曾生姆开始并不愿意，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费了好一番口舌，他总算是同意帮我们去钓鱼岛。而在二〇〇四年的时候，我们决定事先明确告诉船老大租船的目的。这样一来，租船就变得很困难了，要找到一艘主动愿意去钓鱼岛的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后来，这个难题交给了尹冬明——我温州公司的销售经理，一个年轻、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做事情很有能力。尹冬明几

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愿意出海的渔船。

二〇〇四年前往钓鱼岛的渔船“浙普渔二一一一四”号，船老大叫郑念生，胆大心细，有着丰富的航海经验。船是他和一个亲戚合伙的。他们虽然同意出海，但担心船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拖走，将无以谋生。最后，以我乐清公司的名义写了一份担保书，承诺如果船被拖走就由我公司负责赔偿。郑老大和他的亲戚亲自去看了我的工厂，估计我有能力赔他的渔船，于是拿着盖有“神奇电碳集团公司”公章的担保书，收了定金满意而去。郑老大丰富的经验在后来的登岛行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二〇〇四年登钓鱼岛成功，郑老大功不可没。

现在回想起来，船如果真的出事，也只有我自己个人掏钱赔偿了。我的公司是家族企业，当时我是公司管销售的副总，父亲是董事长。公司的公章是我从办公室主任陈南那里骗出来的。事后被父亲说了一顿，说我不该瞒着他把整个公司扯进去。说归说，倒没有任何责骂的意思。

登岛最重要的渔船总算是尘埃落定。剩下的就是其他的后勤物资筹备了。为此，二〇〇四年年初时我在乐清成立了深海蓝鲸户外运动俱乐部，并且请了第一次出海的黑皮（王喜强）做教练。俱乐部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筹备工作。救生衣、食品、药品、通讯工具等陆陆续续汇集到俱乐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登岛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竹竿。我原计划是买二十根少林棍以备登岛后自卫，万一岛上遇到日本右翼青年社分子可以用少林棍把他们赶下海。乐清人民路上有一家运动器材商店，有练武用的少林棍卖，但不巧，当时只有一根样品。于是我付了一百元订金约定三月二十一日提货，不想临到提货时，店家才说交货期还要推后几天。因时间紧迫，不得已临时叫黑皮去买毛竹竿代替。十来根三米多长的竹竿，黑皮觉得太长，打电话问要不要锯掉。我随即答复说：

“不要锯！”武术界有一句话叫“一寸长，一寸强”，没想到因买不到少林棍而临时用来救场的长竹竿后来竟然成了登上钓鱼岛的关键，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吧。

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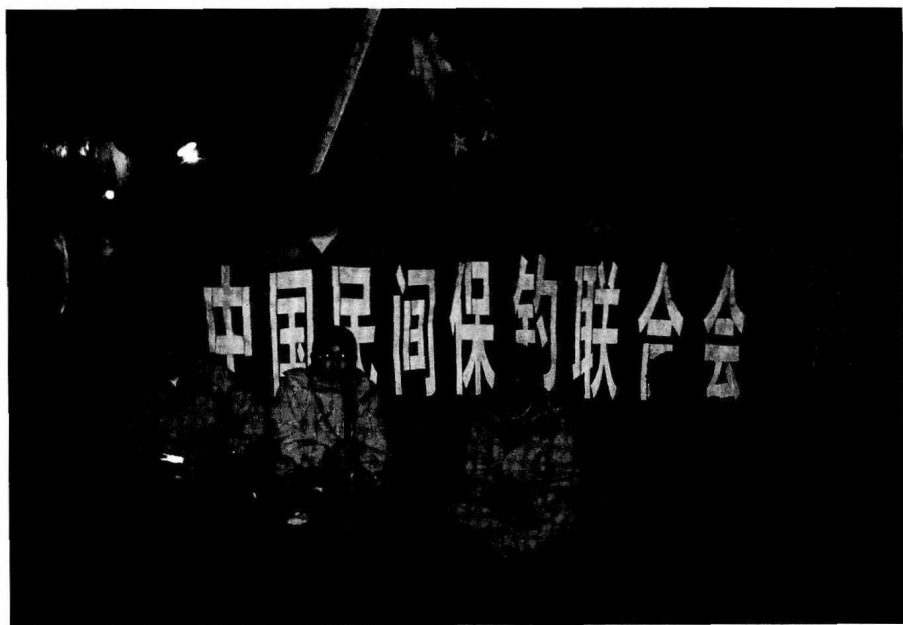
一切准备妥当，只等出发。我和冯锦华分别通知了十三名出海人员。通知只说：“二十一日中午十二点能够到乐清吗？如果能来，到了乐清以后打这个手机号。”号码卡是新买的，电话里也只字未提钓鱼岛，但大家都心领神会。电话通知的十三人全部按时到位，另外还多来了一个人，是湖南经济电视台杨力带来的。据杨力介绍，这人曾在电视台从事过摄影工作，有专业才能。因杨力一再请求，出海队伍由十五人变成了十六人。

除了出海的队员，在岸上还有一支强大的后勤保障队伍。当时北京已经有一个团队给我们二十四小时提供支持。在海边，我们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个团队。我逐个去找了李德云、陈庆余、戴旭阳等几个人，请他们帮忙做后勤。这几个人既有协调组织能力，又愿意为“保钓”付出。对我的请求，无一例外都爽快答应了。他们在岸上提供的强有力支持后来成为我们成功登岛的前提。非常感谢他们！李德云是湖北人，在柳市从事广告业多年，从他来柳市的第一年我们就认识，并成为好朋友。出海用的宣传横幅、喷绘的设计和制作都出自他手。陈庆余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简称HAM，俗称“火腿”，技术也不错。他的加入对我们的通讯起了很大的帮助。在我们出海期间，陈庆余、李德云、戴旭阳三个人二十四小时轮流守在陈庆余家屋顶的短波电台旁边。后来电台还真起了关键作用，登岛队员被抓走后，我们和北京的沟通就全靠这台短波电台了。

三月二十一日晚，所有出海人员和后勤人员聚集在中雁荡山的



出发前的准备



出发前在七里港码头的合影

海隅山庄，海隅山庄只是一栋小房子，是我几年前购得山中民宅改建而成，以“虞海泽的一个角落”之意取名海隅，是我颇为喜爱的周末去处。

当天的晚餐在海隅山庄的小餐厅进行，近二十人围着一张小餐桌，里外两层围在一起，很拥挤。大家兴奋地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讨论着。酒过三巡，人已微醉，我全盘托出计划登岛的三套方案。第一方案：渔船开到离钓鱼岛四十至五十海里的海域，在日本飞机发现我们之前放下小快艇，用小艇载人驶向钓鱼岛，大船往台湾方向行驶以吸引日本雷达的注意，掩护小艇而突袭成功；第二方案：如果小艇被发现，大船则掉头和小艇同时冲往钓鱼岛；第三方案：如果情况不适合放小快艇，或者放快艇之前就已经被日本舰艇发现，则先将大船开到渔区佯装打渔，等找好时机再用大船直接冲向钓鱼岛。计划是做好了，但具体如何行动还是要看当时海上的实际情况而随机应变。

讲完登岛的方案以后，我建议出海人员把身份证件和贵重物资都留在后勤组，或放在海隅山庄。从加拿大不远万里回来参加登岛行动的朱文征做得很周全。他甚至把护照和给家人的信放在写好地址的信封里面，交给我的邻居秋香，嘱咐说如果他没有回来的话，请秋香帮忙邮寄给他的家人。

当晚并没有说次日在哪里登船，也没有说几点钟出发，大家谁也没有多问。晚上大部分人就钻在我准备的睡袋里，睡在我家地板、沙发上。我无法入睡，大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像要准备打仗一样，不停地思考着眼下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还缺少什么东西，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虽然我们不是上战场，毕竟，我们的渔船面对的是载有直升飞机和大炮的日本舰艇；毕竟，带着几根竹竿的我们面对的是日本的武装人员；毕竟，在“保钓”的道路上曾经死过人。一九九六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毓祥就是为“保钓”在钓鱼岛海域

牺牲的。作为此次登岛行动的发起人，深知责任重大。

二十二日下午五点，我们分头开始了出海行动。尹冬明带了大部分人从俱乐部带上物资在黄华码头登船。为了避免招人耳目，把装载小艇的时间安排在深夜，登船后渔船一直锚泊在江中。直到深夜十二点，在瓯江口漂了六个小时的渔船才靠到了七里港码头，基本上在同一时间，灵昆岛上那艘早已备好的旧玻璃钢小艇也被我们雇船拖到了七里港码头。渔船靠岸，迅速接上快艇，大家匆忙拍了一张集体照后就朝着钓鱼岛方向出发了。

十六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和六个船员拥挤在只有十个小床位的小渔船上。床位让给晕船的人，余下的十二人就睡在驾驶舱和机舱的狭窄的地板上，拥挤到连翻个身都很困难。所谓的床铺也就是一个个可以防止人摔下床的开口小木箱，只能够容纳一个人躺在里面。睡在机舱的人还要和噪声做斗争。机舱里的噪声大到即便是坐在旁边的人大声说话都无法听见，只能够靠手势沟通。机舱的过道里还堆放着食物、杂物，十分拥挤也十分肮脏，到处是脚印、泥水。我和冯锦华就这样蹲睡在机舱的过道里，直到天亮。

船有前后甲板，前甲板迎风，航行过程中风大，基本上没有人活动。后甲板是一个不错的活动空间，我们的餐厅和活动空间就在后甲板，只要不下雨，白天坐在后甲板聊天还是蛮惬意。驾驶室在二楼，视野不错。

船出了瓯江口已是凌晨两点多，本来是入睡的时间，人反而更加兴奋。我们的计划一步步付诸行动了。

这次是秘密行动，为了出海队员的安全，离开瓯江口之前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将刚刚拍的十六人合影照用 GPRS 无线网络发给了远在北京的卢云飞。

次日天亮后再看这些出海的队员，所有人的脸上都已经褪去了刚出海时的兴奋，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疲惫。谁也没有兴趣去看海

上的风景，大部分人因为晕船已经吐得东倒西歪了。晕船最厉害的是李南，他是一位坚定的“保钓者”，二〇〇三年出海晕船连绿苦胆汁都吐出来了。这次出海他还是依然坚持前往。到了下午，风浪更大，浪高有两三米，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晕船了。只要一吃东西，海浪就会把你刚刚咽下去的食物给颠出来。很少晕船的我也忍不住开始呕吐，这种滋味真难受啊！我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海上晕船的痛苦滋味。但你或许不相信，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出海是我们详细研究了这些天的天气后做出的决定。从天气的角度看，二十二日前有不适合出海的大风浪，二十六日后有绝对不能够出海的热带风暴，适合航行的时间只有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之间，只是这两天出海要忍受比平常大些的风浪。从时机的角度看，我和冯锦华判断日本人在恶劣天气里对钓鱼岛的戒备和防范可能会放松，选择在这个大风浪和大风暴的间隙时间出海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奇兵”，后来果然也验证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们的渔船很小，只有一百吨左右，可以说是出远海打渔中吨位最小的渔船了。在大海上，小到连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在海上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艇相遇时，由于没有参照物，我们只感觉到日本的舰艇比我们的渔船大，但到底大多少我们并不知道。直到后来有一次在网上看到日本记者在空中拍摄的日本舰艇追逐我们“保钓船”的照片，才知道我们的渔船是多么小。这种悬殊就如同一个稚气小孩和一个而立之年男人的对决。看到照片时，我

的感觉是如此凄凉。想起多年前看过的电影《火烧圆明园》里的一个镜头：手拿冷兵器的中国士兵拼死冲向英法联军用洋枪洋炮筑起的阵地——这种力量的悬殊让人酸楚和震撼。

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二十三日二十二点渔船终于到达第一个目的区域——二六〇海区。这个海区在钓鱼岛的北边，长宽三十海里，钓鱼岛就在隔壁的二六一海区。海浪很大！从大船上放下小快艇突袭的第一方案已经行不通了，大浪很容易会把小快艇掀翻。

我们决定采用第三方案。和我的预期一样，从雷达上看到二六〇海区附近有两艘打渔的渔船，正好成为掩护我们的最佳伙伴。郑老大以低速在二六〇海域来回开，时而来回慢行，时而停机休息，好像是渔船在打渔一样。虽是深夜，我们很清楚日本的巡逻船一定在不远的海域密切地盯着雷达看着我们渔船。我们的渔船雷达只能够看三十六海里以内的船只，而日本的军用舰载雷达能看到几百海里，并且可同时探测空中、水下和水面。这种不对等的较量令人很不舒服！后来我把登上钓鱼岛比喻成一个八岁的男孩把球踢进了有十一个国家队球员防守的球门，可以想象登岛是何等得艰难！

这种模拟打渔的动作估计是有效果的。我可以肯定，日本的舰艇雷达看到了我们的渔船，没有过来查是因为把我们当成了普通的打渔船了。

登岛

在二六〇海域佯装打渔四个小时后，二十四日凌晨两点，渔船开始行动。我们没有直接把钓鱼岛设为目标，而是以时速十节的速度向台湾方向驶去，将航线目标定在途经钓鱼岛距离十二海里的地方。这依然是一个佯装手段，希望继续蒙蔽日本舰艇。打算等到渔船经过钓鱼岛且距离最近时，突然一个拐弯冲向钓鱼岛。这样，等